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探究

◎ 吴畏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化诗歌探究 / 吴畏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1126-090-8

I. 中… II. 吴…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8345号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探究

著 者: 吴 畏

责任编辑: 钟昭会

设计制作: 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60×185mm

印 张: 26.5

字 数: 560千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090-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精神风采的展现	10
-----------------------	----

第一节 深厚的爱国情怀	10
第二节 凝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6
第三节 以民本意识为基点的爱民保民思想	23
第四节 积极进取、执着追求的人生观	35
第五节 和谐的天人关系与和睦的人际关系	43
第六节 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忠贞爱情观	48

第二章 古代诗人个人情愫的表白	53
-----------------------	----

第一节 重德治的个人修身养性情致	53
第二节 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	58
第三节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64
第四节 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	71
第五节 情寄山水、钟爱幽兰的个人情趣	77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基本特征	81
-------------------------	----

第一节 高超的艺术概括力	81
第二节 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	88
第三节 极富魅力的音乐美	92
第四节 百花齐放的绚丽风格	98
第五节 情景交融的意境魅力	105
第六节 卓尔不群的艺术形式	111

第四章 渔猎—农牧时期的诗——中国的原始民歌 117

第五章 先秦时期的诗歌文化 122

第一节 礼、乐文化时代诗文化的代表——《诗经》 122

第二节 先秦时期异军突起的诗文化——骚体 143

第六章 两汉时期的诗歌文化 158

第一节 民间精英对社会人生的诗化关注——汉乐府民歌 158

第二节 诗歌自觉时代的开始——汉代文人之作 161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文化 16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风的形成 164

第二节 慷慨悲歌——建安文学 166

第三节 充满危机感和幻灭感的诗作——正始之音 178

第四节 绮丽之声与慷慨余响——西晋诗歌 182

第五节 照彻东晋夜空的明星——陶渊明和田园诗 189

第六节 乱世中的不同人生追求——南北朝文人诗歌 195

第七节 南北民间文化的迥异呈现——南北朝民歌 205

第八章 唐代的诗歌文化 207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初唐诗歌 208

第二节 盛唐乐章的清亮前奏——初唐诗杰 211

第三节 古典诗歌的极致——如日中天的盛唐诗歌 219

第四节 半个盛唐——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239

第五节 诗中的圣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252

第六节 唐诗史上的第二个高峰——中唐的诗歌 273

第七节 大唐天空的一抹晚霞——晚唐的诗歌 314

第九章 两宋时期的诗歌文化 327

第一节 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北宋诗歌 327

第二节 爱国壮志与田园情怀——南宋的诗歌 350

第十章 金、元时期的诗歌文化368

- 第一节 借才异代与国朝文派——金代的诗歌 368
- 第二节 金代诗歌的亮点——元好问诗 369
- 第三节 南北文化的交汇——元代的诗歌 371

第十一章 明代的诗歌文化379

- 第一节 直逼现实与点缀太平——明前期的诗歌 379
- 第二节 复古狂飙——明代中后期的诗歌 383
- 第三节 创新求变——晚明的诗歌 388
- 第四节 报国激情——明末的诗歌 389

第十二章 清代的诗歌文化392

- 第一节 主空灵与重学问——清初的诗歌 393
- 第二节 中国古老文学的绝唱——清代中期的诗歌 398
- 第三节 传统的残月与近代的曙光——清代末期的诗歌 404

结束语 408

主要参考书目 410

后 记 412

绪 论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璀璨辉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体，也是中华民族在创造民族文化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它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其它组成体一样，以其独具的文化魅力，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不仅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在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如何以非凡的创造力和超人的智慧建立民族文化的历史，而且，它又以其宏廓的精神实质为现今的人们提高自我素质提供着可贵的精神力量，发挥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诞生最早、内涵最丰富、最能表达时代气息、最具影响力、最具群众基础的一个组成体。

相传，中国古代诗歌是产生在中华民族史前的黄帝时期。传说在黄帝以前的时代里，就曾经有过这么一首叫做《弹歌》的原始民歌流传在中华大地上：

竹断，续竹；
飞土，逐肉。

——[清]沈德潜《古诗源》

这是一首朴实无华的狩猎者之歌，它以两字一句二言形式，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生存劳动的一种方式，更可贵的是向世人昭示了诗歌和劳动的关系：劳动孕育了诗歌，诗歌描述了劳动。由此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国的古代诗歌文化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所创作，它一诞生便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散发出当时浓郁的时代气息，展示了当时的时代面貌。对此，鲁迅先生曾作了一个很生动的论述：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鲁迅先生的这段论述，形象地阐明了诗歌产生于劳动生产，是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与其它艺术一样，具有与劳动相伴随的特点。此前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一书，也曾有过与此相似的描述：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地”，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

它生动地描述了上古时代诗歌产生时，它同歌曲、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情状：三人手握牛尾巴，以“投足”的舞姿，唱着诗歌，和着节奏，跳起了舞。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一出现，就展示出中华民族是十分看重诗歌的功利性的。诗歌的功利性的一方面是它的艺术感知力。中华民族的先民，一开始便认为诗歌文化活动本来就是生产行为的重演，也可以说它是劳动过程的回忆。植根于这特定的中华民族土壤中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它必然反映出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发挥出中华民族赋予它的生动的艺术感知功能和鲜明的社会功利，利用诗歌的艺术魅力，表达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热烈愿望和高尚情操。

上古时代，先民们对自然的客观规律缺乏认识，在他们的思维中，认为周围的世界都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其方式就是把语言作为工具，利用语言这个工具，创作出可以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具有咒语作用的诗歌。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理想化了的能力去影响神，实现某种生产、生活愿望，满足对现实的要求。这种特定的社会功利，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整个进程。

二

作为借理想化人的能力去影响神祇，达到生产丰收、生活美好愿望的中国古代诗歌，一出现在华夏大地，便显示出它鲜明的社会功利来。《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

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尧典》

这段记实文字以鲜明的形象，道出了中华民族对诗歌的社会功利的明确主张。这个主张，首要在于鲜明地提出了诗歌的认识作用：“诗言志”。所谓“诗言志”，既指诗人以诗歌抒发其心志，又让统治者通过诗观志，达到利用诗歌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反映社会，改造社会，服务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古代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无不重视诗歌的这种认识作用，进而“采诗观志”。《礼记·王制》就这样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进一步诠释道：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为之诗，咏其声为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艺文志》

正因为诗歌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利作用，中国古代第一位兴私学的孔子，自然把诗歌作为他基础教育的内容了，他从诗歌认识作用所产生的感染力出发，进而对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作了如下全面的阐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他这里所说的“可以兴”，是说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可以唤起人们的意志；所谓“可以观”，是说人们可以从诗歌反映出的社会现实中考见得失，了解社会的风尚、社会的情势变化、社会的发展前景等社会面貌；所谓“可以群”，指的是人们能够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在诗歌传诵与创作中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相互砥砺，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所谓“可以怨”是指诗歌有着干预生活、讽喻时政、嘲讽丑恶的作用。

不能不看到，古人在论及“诗言志”的“志”时，不少人是被儒家“思无邪”的道德规范所禁锢着的，总是站在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点上，处处渗透着儒家仁、义、礼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根本不去或不愿去谈及“诗言志”的“志”的相关一面，即诗人的思想感情所产生的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社会力量。宋人张戒在所撰《岁寒堂诗话》一书中就如此谈到：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

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凜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日而语耶。

——张戒《岁寒堂诗话》

在优秀的传统诗歌文化论著中，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从自身的诗歌实践活动中，跳出了“思无邪”的窠臼，对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作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诠释：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悯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怩，发为文辞，冲澹简远，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又不难哉。

——陆游《渭南文集·曾裘父诗集序》

陆游这种观点，代表了古代诗歌文化论中优秀的传统理论。清代的王夫之在其《诗绎》中把这种传统理论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以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折而群，群乃愈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宴朝而即为冰鉴；“吁谟定命，远犹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逸山、虞道园之说诗，并画而根据之，恶足知此。

——王夫之《诗绎》

这些对诗歌文化社会作用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歌本身的特征，为诗歌理论以至诗歌创作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论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繁荣昌盛。

三

植根于中国土壤中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从它诞生的时期起，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

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多流的，民族文化的形成自然也是多元化、多流化的：

夏族与仰韶文化及其延续龙山文化关系密切；西部地区民族与马家窑系统的文化关系密切；东部地区的东夷诸部族与大汶口文化、今山东的龙山文化关系密切；南方地区的诸部族中，古越人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关系密切；荆蛮、百濮等族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关系密切；东胡诸部族与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关系密切；北方地区的戎狄诸族与以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密切。这些部族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融合壮大，自然形成了多元多流一统局面的民族文化。古代诗歌文化正是在这进程中形成了多元的、多流的民族特色。

出现在中国古代诗坛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中国古代诗歌多元化和多流化的代表。现存于《诗经》中的三百〇五篇诗作，有着“风”、“雅”、“颂”的界别。“风”主要是周朝以及周前期十五个地域的土风歌谣；“雅”是周朝直辖地区的音乐诗歌，它大多是士大夫文士贵族的作品；“颂”是周及周前统治者祭祀神明、祖先所制作的宗庙乐歌。这些诗歌在深刻反映出殷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外交诸方面的社会生活外，又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当时社会政治中的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的各个层面。随着世界交往的频繁，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把中华民族以外的他邦民族诗歌文化、宗教诗歌文化中的可融部分吸收进来，充实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内容。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以其瀚海似的丰富诗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流性。

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其形成还得力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汉语所具有的独特表现能力的发挥。对汉语独特的表现能力，吴存浩、于云翰所著《中国文化史略》中有如此论述：汉语于整齐中含铿锵，于参差中蕴自然，出语掷地可作金石之声，行文成篇可为细雨雷霆。至于其语法，则“有一定之法，又无定之法”，“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是“以意运法”、“以神统形”的“活法”，与西方语法“以形摄神”、“以法适意”的“死法”截然不同。因此古人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表明，汉语已经进入了美学境界，成为一种“以神统形”的特殊中国文化。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借助汉语创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民族文化赋予它独具的民族形意美；而它的形意美又反射出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无穷的艺术魅力。

正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它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始至终拥有一个庞大的作者群。他们之中既有普通劳动者又有文人学士，既有业余作者又有专业作家，既有平民百姓又不乏最高统治者，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既有引车卖浆者流又有僧侣道士，既有成人也有稚童。他们之中就曾出现了诸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黄遵宪等无以尽数的杰出诗人和众多的民间无名作者。在内容上它一代比一代更加广泛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春秋时期充作基础教育的一种必要内容，发展到后来成为殿试取士的依据和条件；从国家礼乐的赞歌发展到文人仕女的雅集；从个人的抒情吟哦，扩大到用于酬唱和题咏；从活跃于变文、骈体文中的文学形式，进一步扩展到用于戏曲、小说的元素。这多如繁星的诗歌，既见于书塾之中又见于个人书斋案头，既见诸纸笺、册牒又见诸戏棚、酒楼、庙宇、亭榭、回廊、

名胜山石间，中华大地随处可见诗歌，整个华夏社会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之中。

如此浩瀚的文化资源，从文字记载而流传至今的中国第一部古代诗歌专集《诗经》，历经“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等嬗变，到清代的古代诗歌，它们是那样的丰富而多彩，那样雄浑有力、蔚为壮观。这种文化现象在国外是罕见的。中国古代诗歌这种非常突出和特殊的、鲜明的民族性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容，使我们的祖国赢得了“诗的国度”的世界美誉。

四

中华民族文化在其悠长的历史长河中，精心培育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这枝艺术奇葩。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与时俱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无时不闪烁出璀璨绚丽的时代的光芒，展示出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以其鲜明而突出的民族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之林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隽永深邃的精神风貌和灿烂辉煌的艺术品位。

在中华民族原始的渔猎农牧文化时代的原始诗歌基础上，发展了农业时代的民族礼乐文化。《诗经》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一当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崭露头角，便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民族特色的诗歌基础。

《诗经》文化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由“野”到“文”的文化进程，而且反映出远古神本文化和由“尊礼文化”到民族共融的民族共同意志的形成。它以其独具的艺术形式，发挥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原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社会作用与美学审美取向作用。《诗经》文化真可谓穷情写物，吟咏情性；辞采葱蒨，音韵铿锵；言短意长，回味无穷；风骨情文，遗篇千祀。

《诗经》时代民歌繁盛，大部分作品是民歌，只有小部分为文人之作。直至屈原及《楚辞》的出现，才让诗歌摆脱民歌的随意性、不稳固性，走上文人借以抒情言志、愉悦性情的创作道路。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从此由“风”进入到以屈原和《楚辞》为代表的“骚”的时代。

屈原的作品，一部分是抒写他个人情怀的诗歌，一部分是他收集加工的民歌。这些作品和所有的《楚辞》作品一样“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屈原的诗歌抒情性所抒写的是诗人的高洁品质，深切地袒呈出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见闻广博、想象丰富、才思巧丽、笔触犀利、境界独特、跌宕生姿的艺术才干。

以后的一段时期，热衷于屈原及汉赋的文人使诗歌的发展走入了一个困境。正当此时，汉代乐府民歌崛起，并以其振聋发聩的新声响彻神州。

汉代乐府民歌把从一言到十言的句式，错落运用于一篇之中，其形式自由灵活生动，能够无拘无束抒情达意。汉乐府民歌这种如此长足的进步，是《诗经》、《楚辞》所不及的。它以犀利的民歌体制痛述民间疾苦，以朴直的语言讴歌纯洁爱情，形成了散发着浓郁人本文化意识的新兴诗歌文化——乐府文化。

汉乐府民歌如此浑然天成的艺术成效，似一声春雷，对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

进了文人诗歌的长足进步。乐府以新颖的形式促进了诗歌体裁的大变革，五言诗崭露头角于诗坛便是其突出的表现。

在汉乐府民歌的促进下，文人们秉承“风”、“骚”风范，突破了汉赋造成的诗歌困境，将汉代乐府民歌以叙事为主转入以抒情为主，开启了文人诗的新面貌，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诞生。《古诗十九首》的诞生展示出文人五言诗崭新的艺术成就，引来了诗歌体裁的大变革。

汉末，文人写诗总是倾心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素，面对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胸怀忧国保民思想的诗人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吸取了《古诗十九首》的精华，创造了这个时代的诗歌文化，这就是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首建安诗人及围绕其周围的建安诗歌的作者群，他们共同形成了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风格，进而繁衍出反映时代面貌的正始诗歌、太康诗歌。他们并力推动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其中阮籍以其五言诗的成就结束了模仿汉乐府的阶段，开辟了五言诗走上兴盛的新征程。从此，古代诗歌更充满了文人意味：抒情成分凝重浓郁，辞藻日益华丽，对偶诗句日益增多，诗风日趋轻绮繁缛。

战乱不断的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处于一个乱世文化大融会时期，这个时期儒学遭禁锢，玄学、佛学得到发展，出现了玄佛合流的文化。儒学则在世族社会中变易出世族文化。于是产生了世族清谈与玄风盛行的诗歌文化。这种消极影响，到了陶渊明的出现才得到荡涤。诗人陶渊明以其清新的笔触开启了田园诗歌的风尚。他的诗既富于情趣，又富于理趣；既是写实，又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许多场景的描写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而他的田园诗所描绘的环境，则进入了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这种清新的风尚成了后来文人诗人所秉承的传统之一。

除陶渊明以外，这个时期，另一些文人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又一次从不同角度促进了古代诗歌的发展。其中生活在中原的鲍照和由中原而居北的庾信，就是其中的代表。鲍照在学习乐府的过程中，写了一些五言四句的小诗，为以后五言绝句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且发展了七言诗，变每句用韵为隔句用韵，为以后律诗的形成奠下基础。由南转北的庾信把南方柔靡清丽的风格与北方粗犷豪放的风格融合起来，为唐诗的繁荣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南北朝中西文化交流、中华各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诗坛出现了一种“新体诗”，提倡写诗要注意声律和对仗的要求。这个要求，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开始走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为文人在完全改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完全意义的诗铺平了道路。

唐代，作为中国诗歌体制之一的完全意义的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作品丰富，文人诗完全成熟，并积累了改造和掌握民歌样式的丰富经验。律诗的兴起和繁荣，便是其突出的表现。

盛唐时期，出现的璀璨辉煌的诗歌文化是这个时期文化的杰出代表。诗人们用他们的诗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表现诗人们博雅风韵的文化生活、多元宗教思想的活跃景况，展示当时繁荣昌盛的盛世为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宏伟志向提供

的坚实基础；记录诗人们为万国来朝的盛况所形成的眼界开阔、思想活跃的共同风貌。诗人们也通过诗歌来宣泄郁闷于怀的怀才不遇、命运多舛产生的感慨叹息。整个唐代，它的诗歌文化充满自信自尊，纵横驰骋，大气磅礴的气势，拥有衷曲万端，闲情洋溢，虚心问道的底蕴。

在创建唐代诗歌文化中，唐初“四杰”突破齐梁宫体诗的束缚，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把青春旋律变成诗歌的主宰，使奋发向上的精神成为唐诗的灵魂。继之，山水田园诗派以追求天人一体的情思，开启了描摹自然美丽的山水景色，抒写闲适、恬静的隐居生活的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边塞诗派通过对多姿多彩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状写，抒发出他们雄浑豪放、慷慨悲凉的情感。陈子昂以其明确的态度，矫正了唐初六朝遗留的萎靡诗风。

“诗仙”李白，则以更有力的创作实绩扫荡了六朝浮靡华丽的诗风。他既不能忍受六朝萎靡诗风的遗留，也不愿受文人律诗的束缚，倾心于民歌的表现形式，将心中的块垒倾泻一空。他的诗，集清新、明快、飘逸、豪爽于一身，表现了“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宏伟气魄、磅礴激情。李白善用多种手法描写祖国的锦绣河山，呈现出既有幻想又有夸张，既有老成又有天真的诗风。其诗篇琅琅上口，沁人心脾，是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诗圣”杜甫，以真挚细腻的感情、精练生动的语言、沉郁顿挫的诗风，表现出忧国忧民的主题，唱出了离乱时代的深沉悲怆。其诗作可谓是文人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秉承了儒家艺术精神，在诗的形式上，他讲究格律的严谨，内容上充满了民歌那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直面现实的精神。这一点到了以宏扬儒家精神为己任的韩愈手里，则成了“文以载道”的工具，出现了韩诗议论化、散文化的趋势。杜甫的诗是最成熟的文人之诗，缺乏唱味；与韩诗相比又无散文化趋向，它包含的是“吟”这种潜在的音乐性。“吟”这种平静而悠扬的调子，是唐代文人诗普遍存在的特点。

中唐诗坛韩愈开辟了以文为诗的途径，白居易则另辟蹊径发起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大多是优美的叙事诗，其声律和谐，语言通俗，文情摇曳，风韵优美。新乐府运动把乐府民歌完全改造成文人诗，古诗从此已完全文人化了，它再不是褐衣荷锄的老百姓所能随心所欲地唱出来的，即使是文人，要写出像样的律诗，也要下一番训练的工夫才能达到。

晚唐的诗反映出时代的衰败色彩。

由于诗的文人化，到了宋代，古诗更加脱离民间，更加脱离生活，走进了一条议论化、散文化的险道。这种局面，即使有陆游的豪放、杨万里的清新，也无法逆转。随着市井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种新的诗体——曲子词脱胎于民间，以充沛的活力登上了诗坛。词从民间曲子词脱胎，历经唐代文人的改造、提倡、推行、传播，于五代两宋得到兴旺发达。词，带着浓郁的民间气味，被改造成了属于雅文化的诗歌之一种。作为雅文化诗歌的一种，它保留着古代诗歌固有的平和、超脱、潇洒、精致和悠然的风格特点，又融合了生动活泼的市井歌谣的特色。它是古代诗歌文化的新形式，是市井歌谣趋于雅致的结晶。

宋词发展到了苏轼时期，苏轼以其激越豪放的性格，才高气盛超脱旷达的文笔，给词注入了李白似的奔放、杜甫似的沉郁、白居易似的明快、韩愈似的险峭，不仅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民间遗风，也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开启了新的词风的革新，使词成为可以脱离音乐独立发展的新诗体。李清照婉约清新、平淡自然的词和辛弃疾豪放雄浑的词，又为宋词增添了光辉。宋词无疑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另一个新的里程碑，它重新将诗歌与音乐相结合，达到了唐诗所未能达到的独特的审美水平；但其文人化的最高点却未能达到唐诗的最高点。

金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平民文化得到勃兴，中国古代诗歌步入了诸体完备的时代。这个时代诗歌的代表，就是曲的兴起和发达，并登上了诗坛领主地位。它倾吐了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同时它向世人昭示，元曲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最后一种形态体制。元代，生活在市井之中的文人，把产生于金代的“俗谣俚曲”与流行于市井的奇趣生动的戏曲、弹词这些俗文化融合，改造成了曲这种诗歌新体。它直接将民间口语摄入散曲，比诗、词更接近口语，使散曲的民间口语化成为散曲的本色。这种嬗变过程，是诗歌的发展由文人改造民歌而使诗歌日益脱离民间，又由诗歌的日益成熟再次回归民间的过程。

五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所创建的，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组成体。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着极富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内涵，有着傲立于世界之林的艺术形式。从思想性、艺术性看，它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这个瑰宝，源远流长，诗人之众，世界他国实属罕见：既有帝王将相，又有平民百姓；既有男儿壮士，又有娇娥才女；既有文人学士，又有农工商卒。体式之繁茂，也是世界他国所不及的：既有朴实无华纯真朴素的民歌，又有婀娜多姿、百花璀璨、魅力无穷的文人之作；既有诗，又有词、曲；诗既有古体诗，又有近体诗……如此种种，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简直是异彩纷呈，奇葩怒绽，生动而鲜明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

漫步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花圃之中，浓郁的爱国情怀促人精神为之振奋；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凝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塑铸着人的灵魂；民本意识的爱国保民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积极进取、执着追求的人生观世代传承；建造和谐的天人关系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人们世代不息的追求……创造这座宏伟的文化精神宫殿的历代诗人们，他们以自身的人品和创作实绩为我们树起了人生的标帜：重德治的个人修身养性情致，铁骨铮铮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九死不悔上下求索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孝悌传家、友信待人以及海枯石烂心不移的忠贞爱情……这些文化内涵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得越来越深厚，成为中华民族的人生美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生息不断的传承与弘扬。

第一章 中华民族精神风采的展现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构成元素——古代诗歌，以其凝炼深沉的精神风貌、博大精深的內容，展现出中华民族文化所拥有的难以消沉和永不颓废的民族之魂。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其优美绝伦的韵文的形式、凝炼的语言、一定的格律、抒情的笔调、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展现出中华民族宏廓伟岸的精神风采：深厚的爱国情怀，凝重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情真意切的爱民保民思想，以“立人”为基点的民本意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为完美人生而积极进取、执着追求的人生观，孝为先、亲为上、血浓于水、友情为重、和谐相处的挚淳的人际关系，情寄山水人不俗、独爱幽兰气自清的个人情致，以及海枯石烂心不移的忠贞爱情等等，屹立在世界文化前列，在世界文坛上绽放着灿烂辉煌的光彩。

第一节 深厚的爱国情怀

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与中华民族建立的中国这样齐名的诸如罗马和巴比伦等世界文明古国。曾几何时，它们便先后从历史中解体了，而我们伟大的中国，却在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吹打中，以磐石般的伟岸身躯屹立在世界东方，发挥着一个伟大国家极其负责的民族的积极作用。究其缘由，根本的一点就是爱国之魂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上扎下深根，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怀抱爱国热忱，心系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让深厚凝重的爱国忧国情愫世代相传，造就了精忠报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弘廓这种浩然正气、民族气节的爱国情怀和忧国情愫，也就自然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思想内容的核心。这个核心同中华民族文化中其它组成体一起，熔铸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极具内向力、亲和力、凝聚力的崇高爱国思想。

中国古代的爱国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也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夏朝到战国后期，中国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的转换。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未建立，

“国家”这个概念含义模糊不清，中华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尚在形成之中，各诸侯国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为对故土亦即是对邦国的热爱。在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的艰难曲折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古代爱国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并诸侯后，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民族心理素质，以及共同生活习惯的中国才实际形成。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使得民族与国家之间有了比以往更多和更直接的同一性，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把中华儿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祖国之爱成为全民族爱国思想的核心，它突出表现在全民族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爱国精神和行动上。

由于时代的不同，中国古代诗歌中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自然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诗经》时代是古代爱国思想形成发展阶段，《诗经》当然反映出以爱故土、爱邦国为基本点的爱国思想。那时的人们认为，他们居住的大地，都是属于管理他们的国王的王土。在这片土地上逐水草而生活的人们，都是拥有这块国土的主人——天子、国君的臣民仆人。《诗经·小雅·北山》中的诗句，正是这种思想的诠释：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诗经·小雅·北山》

现今的人们从这里看到的虽然仅是一种狭隘的、初级形态的国家概念，但它确实是当时产生爱国思想的真实基础：当时的国君自认为天授以管辖权，他们的职责是管理和经营这块邦国土地。国君通过种种方式，让臣仆庶民承认他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土地是国君的领地，国君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热爱乡土保卫邦国，是在热爱自身的生存环境；保卫邦国，是在保卫自己的生活；为国君服劳役服兵役，是他们的天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爱国思想，自然认为乡土和邦国是血肉的一体，因此，爱国情怀就只能是在热爱乡土、热爱邦国的基点上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诗歌的最早总集《诗经》，就收集了不少表达这种爱国情怀的诗篇，其中《秦风·无衣》可以说是它们中间的代表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